

審議的不平等： 台灣公民會議的言說互動

林國明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很多批評者認為，審議民主崇尚理性的言說模式，使得不擅說理社會弱勢群體無法平等、有效地參與審議的過程。批評者所指出的審議不平等是否真的存在？本文以台灣舉辦過的六場公民會議為案例，進行量化與質化分析，來檢證審議不平等的論題。本文根據審議民主理論，使用「發言時間」、「發言頻率」、「開啟議題」、「對話能力」、「說理」和「成為結論」六大面向來測量審議的不平等，並認為，由於程序主義的作用，不同背景的公民，進入公民會議這種程序引導的審議情境，大抵都能說理和影響結論。也就是說，審議不平等只存在於「發言時間」、「發言頻率」、「開啟議題」、「對話能力」四個面向。我進一步指出，這四個面向的不平等程度，是視議題性質而定的。本文認為，審議能力受到「情境知識」所影響；行動者的社會位置，塑造他們的生活經驗，使他們對特定的議題，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和感受。因此，公民們的情境知識，會因議題性質而不同；他們的審議能力，也就會因為議題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關鍵詞：審議民主、公民會議、公共領域、參與式民主、內容分析法

Deliberative Inequality: Discursive Interactions in Taiwan's Citizen Conferences

Kuo-ming L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ritics have said that the practic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has not lived up to the normative standards of political equality, because members of soci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often do not have opportunities to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deliberations. The paper uses data from six citizen conferences in Taiwan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thesis of deliberative inequalities. I use six dimensions in discursive interactions to measure deliberative inequalities: frequency and time of speech, dialogic capacity, initiating new topics, making rational arguments, and influencing conclusions. I argue that because of procedural factors instituted to create the ideal situation of speech, deliberative inequalities are not significant in the dimensions of making rational arguments and influencing conclusions. In addition, inequities in four other dimensions of discursive interaction depend on the nature of issues under discussion. For less complex issues that have greater impacts on citizens' daily lives, most citizens have the "situated knowledge" needed to participate in discursive interactions. Thus, deliberative inequalities are not significant for these kinds of issues. The analytic results confirm the arguments.

Keywor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ublic deliberation, public sphere, citizen participation, content analysis

一、研究問題

目前在民主理論與實踐引起重視的審議民主，是一套有關民主正當性的理念（林國明 2009a; Manin 1987; Bohman and Rehg 1997; Parkinson 2006）。這套理念的基本原則認為，一個具有正當性的政治秩序，必須向所有受到法律和政策決定所約束的人，說明決定的合理性(Chambers 2003: 308)，而辯護政策合理性的說法，如果要能被社會公眾所接受，就要有公共審議的過程，讓所有受到政策決定所影響的民眾，或他們的代表，能夠表達他們的關切和主張，也讓參與者能夠「批評彼此的主張和理由，也以開放的心胸接受他人的批評」(Young 2003: 103)。審議的過程，使各種論點的合理性，接受審慎的衡量和批評的考驗，從中產生足以服人的理由，如此的政策形成過程，才能具有「獲得人民同意」的正當性（林國明 2009a）。

透過說理的過程，公共審議試圖針對眾所關切的問題，找到社會公眾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Gutmann and Thompson 2004)。倡議審議民主的人士因而認為，在多元化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公共審議比較能夠公正地、民主地處理衝突的議題，因為相互衝突的利益和道德主張，比較能在審議的過程中受到審慎、周延的考量。可是，如 James Bohman (1996) 所指出的，如果公共審議要對衝突的議題提出可被接受、具有正當性的解決方案，就必須落實兩個民主原則：政治平等和有效參與。衝突的各方必須要有適當的機會來表達他們的關切，而且要有能力來影響審議的過程和結果。「如果有少數群體認為他們的觀點無法在審議的結果中獲得認可，最終他們將不願意在政治過程中合作地參與解決問題」(Bohman 1996: 107)。

不過，許多批評者指出，審議民主的實踐並沒有落實「政治平等」和「有效參與」的原則。社會的弱勢群體，可能無法有效地參與審議過程。他們可能缺乏時間、訊息與動機來參與，以致被排除在公共審議的場域之外。即使他們能夠進入審議的過程，也可能缺乏機會

和能力來提出論點、影響結論，使得他們的關切無法再現於公共審議。Bohman (1996)將公共審議過程所存在的政治參與和溝通能力的不對等稱為「審議的不平等」(deliberative inequalities)。

隨著審議民主的經驗實踐在全球範圍中逐漸擴大，有關「審議不平等」的批評，也日益增多；這種批評的聲浪，也出現在台灣。體現審議民主理念的各種公民參與模式，如公民會議，於 2002 年之後引進台灣（林國明、陳東升 2003），一度呈現蓬勃發展之勢。短短幾年，台灣成為全世界舉辦公民會議次數最多的國家（林國明 2009b）。隨著審議民主理念與實踐的擴散，像公民會議這類的公共審議，是否對弱勢者造成排除效果，形成「審議的不平等」，也成為國內學者的關切（范雲 2010；陳東升 2006；黃競涓 2008）。

審議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受到法律或政策所影響的公民或其代表，都必須要有機會參與公共說理的過程，才能產生具有正當性的政策。「審議不平等」的論題，則直指核心，挑戰這個基本原則在現實上的可能性(Cohen 2009)。不過，雖然「審議不平等」的議題，受到國內外學者所關切，但卻很少有經驗文獻來檢證「審議的不平等」是否真的存在，弱勢群體是否真的，以及如何在審議的過程中受到排除。本文主要的目的，試圖以系統性的資料，來檢視「審議不平等」的論題。我將以台灣舉辦過的六次公民會議：全民健保、代理孕母、水資源管理、基因改造食品、性交易是否要處罰，以及是否廢除死刑，來探討「公共審議的過程是否存在不平等」這個核心問題。更明確地說，本文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是：以教育程度、性別和所得來區分的社會群體差異，是否影響公民參與審議的平等性？社會弱勢者，如低教育程度、低所得者與女性，是否比較不擅說理，缺乏機會與能力在審議的過程中表達意見，也比較無法影響結論？由於這六場公民會議所討論的議題，所涉及的知識與技術的複雜程度，以及對民衆生活的影響範圍，都有所不同，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如果公共審議的實踐確實存在不平等，那麼「審議的不平等」是否會因為議題性質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如果「審議的不平等」是視議題而定，那理論與現

實的意涵為何？這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課題。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觀點

（一）公民會議與審議民主的原則

本文以公民會議這種審議模式在台灣的實踐經驗作為資料來源，分析公共審議的參與是否存在不平等的現象。在討論相關的理論議題之前，讓我先對公民會議的運作稍作說明。

公民會議是起源於丹麥的公民參與模式，邀請一般公眾針對爭議性的政策進行情報討論，經由說理的過程形成集體意見，供決策參考。執行機構透過公開管道招募參與者，從志願參加者之中，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區，或其他可能影響公民觀點的特質作為分層變項，隨機挑選大約 20 人來組成公民小組。公民小組成員在正式召開會議之前，先利用一到兩個週末的時間進行預備會議，閱讀與議題相關的基礎資料，並透過專家授課，來瞭解政策議題。在預備會議的最後階段，公民小組設定正式會議所要討論的議題，主辦單位根據公民們自行設定的議題，邀請不同立場的專家證人到正式會議來與公民進行對談。正式會議的進行時間大約三到四天。在正式會議中，代表不同立場的專家證人針對議題陳述意見，然後回答公民的詢問。專家證人離席後，公民小組就政策議題所涉及的爭議，進行審議。在審議過程中，參與成員在嫻熟公共對話程序的主持人引導下，互相講理、彼此聆聽，力圖從討論中尋求共識，並將他們的共識觀點，以及無法達成共識的差異意見，寫成結論報告，最後向社會大眾公布，並供決策參考（參考林國明 2009b）。

公民會議這種「微型公眾」(mini-publics)論壇，它的審議原則，接近於 Jürgen Habermas 的溝通行動理論所強調的理性討論模式 (Habermas 1984, 1991)。它有以下幾項特質，一是包容與平等。所有受到政策影響的人，應該要有平等的權利和有效的機會來提出他們的觀點和利益。二是理性論述的言說方式。不管是支持或反對某項主

張，都應該提出理由來辯護，讓大家來判斷哪個論點比較有說服力；參與者也必須有開放的態度，能夠從各方的論點來重新考量自己原先的偏好，願意改變自己的想法。三是以公益取向的言說形式進行論述。在相互說服的溝通行動中，行動者應該以別人可以接受的說法來陳述理由。純粹訴諸自利的說法，難以服眾，因此行動者必須將特殊的利益關聯到普遍關切的觀點。四是追求共識的動機，審議的目標，是針對參與共同關心的問題，尋找能被大家接受的解決方案，這通常必須預設參與者之間要有追求共識的動機，才願意跟別人講道理，同時願意聆聽他人的觀點，反思不同的主張(Elster 1998; Bohman 1996; Chambers 2003; Gutmann and Thompson 1996, 2004)。

（二）公共審議的內在排除

批評者認為，上述理性模式的公共審議存在著不平等。弱勢者不但缺乏足夠的機會參與這類的公共審議；即使進入審議的場域，「理性、公益和共識」的言說方式，也會產生壓抑效果，使弱勢者難以發聲。Iris Marion Young (2002)區分兩種公共審議的不平等：外在排除(external exclusion)與內在排除(internal exclusion)。外在排除指的是，某些社會類別的成員無法進入公共審議的場域；內在排除則是在公共審議的場域內，某些人群無法有效地參與討論。

公民參與的外在排除所顯現的不平等，文獻上有很多研究(DeBardeleben and Pammett 2009; Marien et al., 2010; Verba et al., 2004)。這個面向的不平等，並非本文關切的重點。本文所關心的是：即使公民有機會進入審議的場域，他們是否能夠平等地參與討論？這就牽涉到審議不平等的內在排除。內在排除關注「公共領域的言說互動」(Fraser 1994)，它涉及 Bohman (1996)所說的「溝通能力」：在溝通的過程中能夠開啓議題、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論點、發言不被打斷、成功地轉移討論議題的能力。缺乏這些能力的人，在言說互動中可能遭到忽視而局限於邊緣位置。

Nancy Fraser (1994)對公共審議言說互動的不平等所提出的批判，

堪稱經典文獻。她在批評 Habermas 理想化的領域模式時指出，Habermas 錯誤地假定公共討論是公民間平等的對話而忽略社會不平等。Fraser 指出，女人、少數族裔或弱勢的從屬群體，不但無法進入「自由主義模式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即使能夠進入也無法有效參與討論，因為「社會不平等侵入了審議」。她認為，公共領域的言說互動是被某些與地位差距相關的禮儀和風格所支配，透過非正式的運作形式使女性和弱勢階級在審議的過程中被邊緣化。在言說互動中，「男人常會打斷女人講話，這情形比女人打斷男人講話來得頻繁；男人也比女人多話，講話的次數較多，時間也較久」，這使得有些女性主義的政治理論家認為「審議是穿戴面具的支配」(Fraser 1994: 119)。

許多審議民主的批評者也呼應 Fraser 對審議不平等所提出的關切，Lynn Sanders (1997)的批評是另一個重要貢獻。在 Sanders 看來，Fraser 所指出的言說互動中「與地位差距相關的禮儀與風格」，是與崇尚「理性」的審議模式相結合的。Sanders (1997: 348-349)認為，「審議」帶有「理性、謹慎、克制、安靜、社群、無私、普同」的強烈意涵；將「審議」等同於理性言說，結果是弔詭地使審議民主的運作帶有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性格。因為「某些公民比較能夠以理性的，說理的方式來提出論點」，相較之下，說話吞吞吐吐、斷斷續續，比較容易激動，帶有情緒，訴諸個人經驗的發言，就容易引起聽者的不耐與忽視。無法說理的人，通常是那些在正式的政治制度中缺乏代表性的弱勢群體，如婦女、少數種族和族群。最需要利用審議論壇來發聲的人群卻被消音。

Young (2002)也認為，崇尚理性的溝通形式對弱勢者具有排除性和壓迫。在主流觀點中，理性言說，偏好具有邏輯結構的論證、條理清晰的表達，以及不帶感情的講話方式。這種講話的風格和溝通能力，是優勢群體比較容易習得的文化資源。不善說理的女性和少數群體在崇尚理性的言說互動中居於劣勢，無法有效參與。

理性之外，Young 更進一步指出，崇尚公益與共識的審議模式，也對弱勢者不利，使弱勢者無法影響討論的議題和結果。雖然審議的

目標是要找出參與者可以達成協議的方案來解決共同的問題，但若以公益之名強求共識，可能使得優勢群體的成員能夠宰制對所謂公益或共善內容的定義，而鞏固優勢者的利益與價值。爲了達成符合公益的共識目標，弱勢者的需求與抱怨，可能被詮釋爲「與公益相違」而被消音；有些困難的問題，可能被認爲難以達成共識，而被排除在討論的範圍，而這些困難的問題，可能正是弱勢者受苦的根源。因此，在不平等的社會中，公益的理念和共識的目標，可能限縮了議程，成爲排除的手段(Young 2002: 42-44)。這種存在內在排除的審議過程所形成的結論，難具包容性，也就不能成爲民主正當性的來源（參考 Bohman 1996）。

（三）審議不平等的經驗研究

以上文獻所指出的審議的不平等，是否真實地發生在審議的場域和過程呢？John S. Dryzek 認爲，「我們並不知道」，他說：

這些對審議的批評是否具有說服力，仍然是個開放性的問題，有待禁得起考驗的經驗調查，來檢證到底在什麼程度上，這些宣稱確實發生在審議過程的說法，的確描述了事實。(Dryzek 2000: 66-67)

不過，有關審議不平等的經驗研究，如鳳毛麟角；少數可得的研究，探討的面向主要是「外在的不平等」，而這類經驗研究的發現，與前述審議不平等的宣稱，不盡相符。例如，Archon Fung (2003)發現，在芝加哥地區，貧窮社區的居民對於治安問題的審議式治理，參與的程度比較積極；有關巴西榆港(Porto Alegre)參與式預算的研究，發現窮人、低教育程度、婦女和少數族裔的參與比例較高(Abers 2000; Baiocchi 2005)。可是當這些弱勢群體進入審議的場域之後，在論述互動方面是否具有平等參與的機會？國外文獻欠缺這方面的經驗研究。國內學者對審議過程的「內在不等」，倒是有些經驗研究。

陳東升(2006)以台灣舉辦過的產前篩檢與檢測、全民健保、稅制改革三場公民會議討論逐字稿為資料，發現在這三場公民會議中，產前篩檢與檢測，和稅制改革這兩場公民會議，教育程度越高的參與者平均發言次數都遠高於教育程度低的參與者。我過去的研究(Lin 2005)則利用全民健保、代理孕母和高雄跨港纜車三場公民會議為經驗對象，以問卷調查中參與者自我報導的「發言程度」為資料，¹分析不同教育程度、性別和所得的參與者，是否存在發言的不平等。我過去的研究有幾個重要的發現。我指出，審議過程確實存在參與的不平等，但以教育程度、性別和所得測量的社會經濟地位變項，對溝通不平等的影響並不一致。收入差異對發言頻率的影響並不顯著；性別的影響並不一致，在某些議題，女性發言的頻率高於男性。教育的影響在不同的案例都影響發言的頻率，教育程度高者較常發言，但顯著程度又因議題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對民衆生活影響領域廣泛的議題，如全民健保，教育差異所造成的溝通不平等較不明顯。

陳東升和我過去的研究存在一些限制。首先，我們的研究都發現審議不平等的情形會因議題性質不同而有所差異。何以如此？這兩篇文獻都沒有提出理論觀點的解釋。其次是議題差異面向與研究個案的關聯。我過去的經驗分析關注議題的兩個面向，技術複雜程度和影響範圍，而認為技術複雜程度較低、議題影響範圍較廣泛的，參與不平等的情形較不顯著。但三個案例並沒有窮盡兩個議題面向的不同屬性。另外，有關議題性質的分類，主要是依賴研究者的界定，而非參與者的認知。最後，陳東升和我過去的研究對審議過程的「內在排除」，主要關注的是發言頻率和時間，但忽略論述不平等的其他重要面向，例如，Fraser (1994)、Bohman (1996)和 Young (2002)等人所關注的說理能力、開啓議題和影響結論等方面的差異。

本研究針對過去文獻的缺陷，提出更為周延的研究設計和分析，來檢證、修正和精鍊審議不平等的理論。我以六場公民會議實際發生

1 問題是：「請問您在會議中經常發言嗎？」答項是：「經常發言」、「偶爾發言」和「從未發言」。

的審議過程為資料，以參與者的主觀評價來界定不同場次的公民會議的議題性質，並提出理論觀點，來分析不同社會經濟位置的參與者，在論述互動的諸多面向上，是否存在著審議的不平等；以及，審議不平等的情形，是否因為議題性質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四）審議不平等的面向

前面提過，審議的不平等包括「外在排除」與「內在排除」；本文主要關切的是內在排除。文獻上對外在排除的界定較為一致，指的是某些社會類別的成員無法進入公共審議的場域；對於內在排除所涉及的不平等，則有不同的經驗指涉。大部分的著作，例如前面討論到的 Fraser、Sanders 和 Young，著重在公共審議所崇尚的「理性的言說形式」所造成的排除效果。這些觀點認為，因為社會經濟弱勢者不擅長說理，比較傾向講述個人經驗，因此怯於在強調說理的審議過程中公開表達意見，即使發言，也比較短促。這些批評所側重的審議不平等的面向在於：是否採用說理的言說形式，以及與此相關的發言次數和發言時間。

Bohman (1996)對審議不平等的關注，則在於特定團體是否有能力可以有效地影響審議的過程。說理、發言頻率和時間，這些言說互動的面向，當然是發言者的觀點是否能夠在審議的過程中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但除此之外，還有些言說的面向是我們在分析審議的不平等時必須關注的。首先，Young (2002)指出，公益的理念和共識的目標，可能限縮了審議的議程，使得弱勢者的關切無法成為討論的議題。要降低議程設定所造成的不平等，發言者必須要有開啓議題的能力，讓其他參與者願意跟隨這個議題進行討論，才能使自己的關切在審議過程中受到考量。其次，審議是具有相互性、合理性的公共對話(Young 2002; Gutman and Thompson 1996, 2004)，發言者不能一直申述自己的主張，她也要能聆聽其他人的說法，澄清事實，反駁他人的論點，才能讓自己的主張有說服力。而且，她不僅要和其他參與者對話，也要和專家對話。公民會議這類的審議論壇經常邀請專家來提供意見，專

家意見也確實會對公民意見產生影響。參與討論的公民，能否利用機會來詢問和反駁專家的說法，也是我們評估其是否有能力可以影響審議過程的重要面向。我們可將「澄清事實」、「反駁成員」、「詢問專家」和「反駁專家」這四個言說面向，共同構成「對話能力」的綜合指標。最後，審議的目的，終究是要針對共同關切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Thompson 2008)，對審議不平等的關切，必須分析參與者對審議結果的實質影響，也就是說，參與者的意見是否成為結論。

發言次數、發言時間、說理的頻率、開創新議題、對話能力，以及意見成為結論的比例，是本文測量審議不平等的六大面向。過去的文獻討論，可能只側重在某些特定的面向，如發言時間或頻率，本文則是全面性地觀察不同社會範疇成員在這些面向上是否存在不平等的情况。

（五）程序主義的作用

過去的文獻，對於審議過程中言說互動的不平等，要不就是不作面向的區分，要不就是認為，審議的不平等在各個言說互動的面向是一致的。本文建構言說互動的不同面向，並試圖分析審議不平等的現象在這些面向上是否有所差異。要做這樣的分析，必須了解審議程序對言說互動的不平等所可能產生的效果。

公民會議，一般稱為「程序主義」的審議模式，它使用一套特定的程序規則，來指引「誰來審議」和「如何審議」，以達到理想的言說情境（林國明 2013）。前面的討論指出，許多批評者認為這種審議模式強化現有社會結構的不平等，使得社會優勢者支配審議的過程。這些批評往往忽略，公民會議這類的審議論壇，有意地透過某些程序的操作，來降低不平等。Joshua Cohen (2009)指出，從現有的證據來看，審議不平等，雖然值得關切，但有點被過度誇大，因為批評者低估了審議論壇對不平等的反思與修正能力。他認為，審議論壇的實際運作，能夠認識到參與審議的過程可能存在的平等，並採取作為來降低參與的偏差，尤其是協助參與者了解相關的政策議題以提出論

點，例如，在芝加哥的教育與警政改革中，主事者就曾協助訓練參與審議的公民，提升他們參與討論的能力(Cohen 2009; Fung 2003)。

Cohen 認識到審議能力與議題知識有緊密的關係。公民會議的運作，確實透過一些程序作為來協助參與者了解政策議題，例如，提供淺顯易懂的閱讀資料，以及安排專家演講與對談。國內也有不少研究審議民主的經驗文獻，介紹公民會議的操作程序，探討了公民會議的說理過程、共識形成、自我轉化機制，以及公民和專家的互動，如何在程序規則下運作（林國明、陳東升 2003；黃東益、李翰林、施佳良 2007；黃東益、施佳良、傅凱若 2007；林祐聖 2007, 2010）。不過，分析程序作為是否協助參與者瞭解政策議題的文獻，比較有限。黃東益、李翰林、施佳良(2007)的研究指出，有七成以上的參與者主觀上認為閱讀資料、專家演講、專家詢問以及成員互動這些程序作為，對個人瞭解議題是有幫助的。林國明、陳東升(2003: 87)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這些促進公民知能的程序，確實影響了發言的能力，「公民們在進入討論之前，其認知能力的既存差距造成發言機會的實質不平等。但在會議過程中，由於基礎資料的提供、專家對談提升了參與者的知能，因而降低了認知能力以及發言機會的差距」。

即使經過程序的修正，公民的發言狀況仍可能存在不平等的狀況。過去的研究指出，「知識」差異是導致發言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林國明、陳東升 2003）。根據公民的自我詮釋，公民會議雖然提供閱讀資料和專家演講來幫助參與者了解議題，但是，「每個人的領悟能力不一樣」，「知識」的差異依然存在。比較簡單的議題，「大家都有吸收到」，議題知識的差異可能並不明顯；但對於比較複雜的議題，「有的成員會跟不上」，這些參與者因為「了解的知識層面有限」，因此就比較少發言，而呈現發言不平等的現象（林國明、陳東升 2003: 87-88）。

在本文所界定的言說互動的面向中，發言頻率、發言時間、開啓新議題、對話能力這四個面向，與議題知識特別有關。討論議題的相關知識比較豐富的參與者，比較可能發言，開啓新的討論議題，質疑

他人的論點。公民會議的程序因素，可以提升參與者對議題的了解，因此可能降低參與者在這些言說互動面向的不平等。但這種程序作用，對於較為複雜難懂的議題，效果可能比較有限。在具有技術複雜性的議題領域，因為參與者之間存在著知識差距，因此，我們預期在這些言說互動的面向可以發現審議不平等的現象。

除了上述四個言說互動的面向之外，程序因素也可能影響「說理」和「影響結論」這兩個面向。過去的研究指出，協助提升公民的知能，有助於促成說理的溝通，因為會議資料與專家對談提供「共同的資訊與知識基礎」，所以提出主張必須「訴諸事實的東西」、「不會流於意氣之爭」，也比較能判斷別人「說得正不正確」（林國明、陳東升 2003: 89-90）。另外，參與者在進入公民會議的審議場域時，就大抵接受了審議的規範期待，認為公民會議「和私下討論不同」：「要提出意見，要為自己的意見負責」、「要權衡不同觀點」，而有了說理的自我要求（林國明、陳東升 2003: 89-90）。最後，公民會議是「共識取向」的審議模式，尋求共識的驅力，不但強化說理的傾向（Young 2002），在操作上也盡量將差異的意見整合成可以共同接受的方案。黃東益、施佳良、傅凱若(2007)也以台灣公民會議的操作經驗指出，不同立場的參與者會透過說理的溝通，在交詰過程中加強自己的論理，尋找大家可以接受的理由而形成共識。這種追求共識的程序，也使參與者的意見，比較可能成為結論。

程序因素對於促成說理與影響結論的平等，在不同的議題領域可能無甚差異。對於某些技術複雜的議題，弱勢者即使經過程序修正之後，可能還是較少發言；但是，一旦她們發言，在審議場域的規範預期以及程序因素的協助下，她們可能還是傾向採取說理的言說形式，而且能夠影響結論。因此，根據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預期，在比較複雜、一般民眾比較難了解的議題領域，不同社會範疇的公民在發言頻率、發言時間、開啓新議題和對話能力，將有顯著差異，但在「說理」和「成為結論」這兩個面向，則無差異。換句話說，無論在任何議題領域，優勢者不見得比較會說理、比較能影響結論。

（六）社會位置、情境知識與議題性質

既有的文獻不但認為審議不平等在言說的不同面向是一致的，也傾向於假定不平等同時存在於不同議題。但少數經驗研究已經指出，審議不平等的程度會因議題性質的差異而有所不同（陳東升 2006；Lin 2005）。前面的討論指出，審議不平等，會因為議題的技術複雜程度而有差異；除此之外，我過去的研究(Lin 2005)指出，議題影響範圍較為廣泛的議題，發言不平等的現象較不顯著。為何審議不平等的程度會因為議題性質的差異而有所不同？Young (1997, 2002)所提出的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具有啟發性。

Young 雖然認為強調理性言說的公共審議可能會形成不利於弱勢團體的不平等，但她同情、支持審議民主的基本理念。她主張公共審議應該包容多重言說形式，將各種差異的觀點，包括弱勢群體的觀點，納入審議過程，才能使公共審議達到合作、相互了解與正義的結果。她認為，性別、階級、種族等多重不平等原則建構特定的社會位置；社會行動者所處的社會位置，塑造他們的經驗，也形成他們的「情境知識」。這種知識，包括他們對自身位置，以及與其他位置的關係的了解；對影響他們生活的社會運作過程的詮釋；以及因為特定經驗而產生的有關自然與物質環境的觀點。這些觀點包含對公共討論的議題所提出的一些問題、經驗及理由背後的假定。她認為包容各種獨特的社會觀點將使人們對審議的議題有更全面、客觀的瞭解(Young 1997, 2002)。

Young (1997: 394-395)認為，情境知識是對社會生活的獨特面向所具有的「敏感度」。特定的生活經驗使人們關注某些事物，而能夠提出獨特觀點。人們是否能在公共討論中發言、如何發言，誠然受到很多因素影響，但如果人們能夠敏感地意識到討論的議題與個人生活經驗的關聯，如果議題能夠喚起人們對他們經歷到的事物的關注，人們就比較可能在公共討論過程中發言、提問、質疑、講理。這意味著，公共議題的性質與社會位置所產生的情境知識的關係，影響到參與的差異。如果社會行動者的情境知識，使他們能對特定的公共議題所涉

及的社會關係與物質環境，以及對他們生活的影響，提出詮釋與觀點，也就比較可能參與公共討論。

議題的影響範圍與情境知識有關。如果議題的影響範圍比較狹小，我們必須分析不同社會位置的群體是否具有與討論議題相關的情境知識，才能進一步推論特定的弱勢群體是否在這類的公共討論中噤聲而呈現不平等的現象。這是困難的分析工作，因為社會位置是被「多重不平等」的原則所交織建構的，在人數規模很小的審議論壇，很難做經驗測量。但我們可以有信心地說，在影響範圍非常廣泛的議題，例如全民健保，各種社會群體，不管是男人或女人，窮人或富人，教育程度高或低的，都在他們各自的社會位置和互動中經歷了相同制度或政策運作的獨特面向，有各自的情境知識和社會觀點可以表達，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在這類影響範圍廣泛的議題，審議不平等的現象將較不顯著。

Young (1997)也注意到，獨特的社會生活經驗所能提出的觀點，是受限於文化與物質資源的。特定社會群體可能具備討論議題的情境知識，但他們的文化與物質資源卻可能使他們只能關注獨特的事物，而對其他事務感到晦澀難解。低教育程度的失業勞工，有著無力繳交保費和失去健保身分而沒錢看病的經驗，因此對於保費的調漲，心有所感而能侃侃而談，但他們可能無法了解「總額預算」作為醫療費用控制手段的運作。這類具有高度技術或制度複雜性的議題，需要抽象化的知識，才能了解它對社會關係和實際生活的影響，而唯有某些特定的社會位置能夠賦予行動者運用抽象知識的文化資源，這經常與社會經濟地位，尤其是教育變項相關聯。另外，坐落在特定位置的群體，也可能因為與其他群體的互動模式，形塑某種言說的風格，以致於比較難對「困難」的議題發言。例如，許多文獻指出，女性的言說風格，比較溫和有禮、講求清晰，因而顯得委婉、猶豫，不那麼果斷、有信心，避免觸犯他人或引起爭議(Crawford 1995; Gray 1992; Lakoff 1975; Siegler and Siegler 1976)，因此對於比較深奧、不熟悉的議題，她們的發言比較謹慎、保留，不會像男性一樣，大膽地直言不

諱，不怕說錯。因此可以推論，具有高度技術或制度複雜性的議題，性別間存在著言說互動的不平等。

（七）研究假設

根據前面的討論，本文有以下幾個經驗假設：

假設一：社會群體之間的審議不平等，存在於發言頻率、發言時間、開啓新議題、對話能力四個面向，在說理和影響結論這兩個面向則無顯著差異。

假設二：社會群體在發言頻率、發言時間、開啓新議題、對話能力這四個言說面向的不平等，其顯著程度，因為議題的技術複雜性和生活影響範圍而有所差異。在假設二之下，有四個更為明確的假設。

假設二之一：在「生活影響範圍大」和「技術複雜程度低」的議題領域，因為情境知識和程序因素的作用，絕大多數的參與者對議題有直接的生活經驗和了解能力，都能參與討論，因此審議不平等的情形最不顯著。

假設二之二：在「生活影響範圍小」和「技術複雜程度低」的議題領域，雖然大多數的行動者對該議題缺乏情境知識，但是，程序作用增進了他們的議題知識而能參與討論，因此審議不平等的情形相對較不顯著。

假設二之三：在「生活影響範圍大」和「技術複雜程度高」的議題領域，雖然大多數的行動者對該議題具有情境知識，但是，議題過於複雜，程序因素對於增進議題知識的作用有所限制，弱勢社會群體成員因為缺乏相關知識或受言說文化的影響，較難參與討論，因此審議不平等的情形相對顯著。

假設二之四：在「生活影響範圍小」和「技術複雜程度高」的議題領域，大多數的行動者對該議題缺乏情境知識，再加上議題過於複雜，弱勢社會群體較難參與討論，因此審議不平等的情形最為顯著。

三、資料與方法

本文同時使用量化和質化方法進行分析。我先以統計分析確立因果關聯的經驗效力之後，再利用質化分析來探究因果機制的作用，解釋程序因素和情境知識如何影響審議的不平等。我選擇台灣曾經辦理過的全民健保（2005 年）、代理孕母（2004 年）、水資源管理（2006 年）、基因改造食品（2008 年）、性交易是否要處罰（2008 年），以及是否廢除死刑（2008 年）六場公民會議為研究案例。統計分析方法有二：首先，我將六場公民會議所有參與者包含在一起，進行一般迴歸分析，以檢證假設一，探討不同社會群體在本文關注的各個言說互動的面向上是否有顯著差異。這六場公民會議所討論的議題，在技術知識的複雜性、對生活直接的影響範圍，有所差異。我在 2011 年 7 月對曾經參加過公民會議的公民進行訪談，詢問他們對六個公民會議議題在「技術複雜程度」和「生活影響範圍」的評價。根據參與公民的評價，我選擇技術複雜程度高／生活影響範圍大、技術複雜程度高／生活影響範圍小、技術複雜程度低／生活影響範圍大，和技術複雜程度低／生活影響範圍小的四個議題，針對個別場次進行分析，以 Wilcoxon Two-Sample Test 來檢定不同的性別、教育和所得群體在言說互動面向上是否有顯著差異。這部分的統計分析，是在檢證假設二，評估社會群體在言說互動的不平等，其顯著程度，是否因為議題的技術複雜性和生活影響範圍而有所差異。在做完統計檢定之後，我以質性分析來解釋和討論研究發現。這部分的資料來源有二：一是每場公民會議會後對參與者所做的深度訪談，二是從參與六次公民會議的公民中，抽選 24 位公民，於 2011 年 10 月舉行兩場焦點座談，針對審議過程的不平等議題進行討論。本文質化分析所引用的資料，主要來自這兩場焦點座談的逐字稿。以下針對量化和質化方法的資料來源和操作做說明。

（一）量化方法

1. 資料來源

量化分析的資料來源有三；最主要的部分是六場公民會議審議過程的逐字稿。本研究所分析的這六場會議都是由中央政府機構委託同一學術機構辦理，由同一位學者擔任計畫主持人，採用相同的程序結構進行公民討論，因此，可以避免程序因素的干擾。

前面曾對公民會議做過簡短介紹。公民會議分預備會議和正式會議兩個階段。預備會議和正式會議的過程，全程錄音錄影，並整理成逐字稿。由於預備會議階段主要是專家的專題演講，公民詢問通常是請專家補充說明，缺乏公民之間的言說互動，以及公民和專家的對話，因此本的分析將忽略預備會議階段，而以正式會議中各個時段的會議紀錄逐字稿，作為分析審議過程的資料來源。我以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方法，將這六場會議逐字稿進行過錄(coding)，來測量言說互動的六個面向。請見下一小節過錄方式的說明。

第二個資料來源，是每場公民會議進行之前對參與者所進行的問卷調查。我以問卷調查的教育、性別和家庭所得來測量參與者的社會經濟位置。

第三個資料來源，涉及議題性質的分類。本文假定議題的性質影響到參與者的「情境知識」，進而影響到審議不平等的情況。我將議題性質分為「與一般民衆生活的關聯程度」，以及「技術的複雜程度」。議題的性質，應該由公民來判斷。我訪問曾經參加六次公民會議的公民，詢問他們對代理孕母、全民健保、水資源、基因改造食品、性交易和廢除死刑的看法。與議題性質有關的問題包括：「您覺得這個議題和一般民衆生活有沒有很大的關係？」、「您覺得一般民衆要了解這個議題會不會很困難？」。訪問在2011年6月至8月間進行，在116位全程參與六次公民會議的公民中，共成功訪談75位，約有六成五的參與者接受訪談。受訪者的性別、教育程度和所得的分佈，與全體參與公民相較，男性、高教育程度和高所得者的比較較高（表一）。

表一 電話訪談受訪者背景，與全體參與公民比較

參加公民會議場次		性別			教育程度		所得	
		小計	男	女	高	低	高	低
代理孕母	受訪者	7	4	3	6	1	4	3
	全體公民	18	6	12	13	5	6	12
全民健保	受訪者	12	7	5	7	5	8	2
	全體公民	20	10	10	11	9	14	4
水資源	受訪者	13	7	6	7	6	7	5
	全體公民	20	10	10	11	9	9	10
基改食品	受訪者	15	9	6	14	1	9	6
	全體公民	20	10	10	15	5	11	9
性交易	受訪者	14	6	8	11	3	8	4
	全體公民	18	8	10	12	6	10	6
死刑	受訪者	14	9	5	8	6	7	6
	全體公民	20	10	10	12	8	8	9
全部	受訪者	75	42	33	53	22	43	26
			56%	44%	71%	29%	62%	38%
	全體公民	116	54	62	74	42	58	50
			47%	53%	64%	36%	54%	46%

在受訪公民的回應中，全民健保和水資源這兩個議題，與民衆的生活關聯度最大，各有約 98% 的受訪者認為全民健保和水資源與一般民衆的生活「有很大的關係」。其他四個議題，僅有約三到七成的民衆認為與民衆生活「有很大的關係」。在技術的複雜度方面，受訪公民認為基因改造食品最為困難，有八成五的受訪者認為一般民衆要了解這個議題「非常困難」或「有點困難」；其次是全民健保，回答「非常困難」或「有點困難」合占約六成五；其他議題比例較低，認為「非常困難」或「有點困難」的比例約四到五成。

根據受訪者的評價，我選擇全民健保、水資源、基因改造食品和性交易四個議題，作為「生活影響範圍」，以及「技術的複雜程度」兩個面向交叉的議題。全民健保和水資源是「生活影響範圍」較大的議題，全民健保的技術複雜度高於水資源。基因改造食品和性交易是

「生活影響範圍」較小的議題，基因改造食品的技術複雜度高於性交易。我用四場會議來代表技術複雜程度高／生活影響範圍大、技術複雜程度高／生活影響範圍小、技術複雜程度低／生活影響範圍大、技術複雜程度低／生活影響範圍小的這四個議題類型。我將分析審議的不平等在不同的議題類型上是否有所差異。

表二 議題性質與研究個案

		技術複雜程度	
		高	低
生活影響範圍	大	全民健保	水資源
	小	基因改造食品	性交易

2. 過錄、變項與測量

會議逐字稿的過錄工作乃就本文所關切的審議不平等的面向「發言頻率」、「發言時間」、「說理」、「成為結論」、「開啓新議題」和「對話能力」進行內容分析。每場公民會議的過錄都建立一張總表。依照會議進行時序，以依序發言的公民每一次的發言為觀察單位，過錄以下項目：(1)發言公民代碼；(2)發言的逐字稿行數；(3)發言內容是否進行說理；(4)有沒有澄清事實、反駁公民、詢問專家和反駁專家；(5)這段發言提出的論點或主張，有沒有寫進結論報告中。另外，如果發言者的論點或主張，是先前沒人提過，但在後面的逐字稿中，發現它成為討論的議題，則要回過頭來記錄這段發言有「開啓新議題」。完成這張總表，可以統計每位公民在上述六個面向上的數值。因為總表是根據正式會議每個時段中，依序發言的公民每一次的發言為觀察單位，因此可以根據會議逐字稿對於過錄結果進行查核，以確保編碼的信度。

本文所關切的審議不平等的變項包括發言頻率、發言時間、說理、成為結論、開啓新議題和對話能力。測量方法如下。

(1)發言頻率：根據會議逐字稿中公民發言的次數統計。公民針對討論議題所提出的論點、程序的發言、對其他公民的片段性反駁、澄

清前面公民的發言內容或意思，都包含在次數統計。公民在發言過程中如被主持人或其他公民打斷後繼續發言，則不重複計算次數。簡短的會議詢問也不計算次數。

(2)發言時間：按照逐字稿中公民每一次發言的總行數統計之。逐字稿的文字格式如字體和每行字數都調整至完全一致。

(3)說理：公民針對會議討論主題，提出主張，稱為論點。針對論點能夠提出理由，即構成說理。只要有提出理由，不管理由的長短、是否有證據支持、是否有說服力，都過錄為說理。針對每位參與公民，計算提出論點的次數，以及每個論點是否進行說理的次數，可以統計每人的發言中說理的比例。

以下舉例說明何者構成說理。例如，針對「性交易是否要處罰？如果要處罰，應該罰誰？」這個議題，A 公民說：

本人主張是（娼妓、嫖客和第三人）三者皆不罰。原因是若今天罰娼妓，會變成性交易地下化，跟罰嫖是一樣的，這樣產生地下經營的法律漏洞，讓性工作者受到更大的暴力與剝削。所以，我希望性交易能合法，法律在這上面可以有更明確詳細的規範，不會造成性工作者被剝削。（性交易要不要處罰公民會議，綜合討論一會議逐字稿）

B 公民則說：

我是認為性交易算是一個成年人自己的選擇權，兩個成年人彼此同意的事，這是一種自主權，不是說鼓勵他去做這件事情，但是他應該是可以被容許的工作，至於要不要選擇去做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法律或政府不應該介入。（性交易要不要處罰公民會議，綜合討論一會議逐字稿）

A 和 B 兩人的發言，都構成說理。嚴格的說理，有著從前提和命題衍

生出結論的邏輯結構(Young 2002)。公民的說理，隱含這樣的邏輯結構，但他們不見得能將前提清楚地說出來，而作嚴謹的推理。例如，在 A 公民的發言中，隱含的前提是法律應該要保護人民避免受到剝削，命題是性交易不合法會造成地下化而導致剝削，因此衍生性交易必須合法化才能避免剝削的結論。B 公民主張的前提是法律必須維護人民的自主選擇，命題是成年人自願的性交易是一種自主選擇，結論是法律不能處罰性交易而傷害人民的自主選擇。A 和 B 公民的差異在於 A 公民的命題是因果陳述，B 公民的命題是價值斷言；不管是價值斷言或因果陳述，也不管因果陳述是否具有經驗效力，都構成說理。

針對同一個討論議題，C 公民表示：

性交易到底要不要處罰？我的改變很大，從我剛開始接觸到這個議題到現在，聽了性工作者的意見之後，還有很多專家的看法，也改變了我很多。原本我認為要處罰，現在我也有比較寬容的看待。我覺得我們的法律應該不要干涉這部份太多，不要處罰。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有一個好的管理制度存在。（性交易要不要處罰公民會議，綜合討論一會議逐字稿）

D 公民說：

要不要處罰，我也不會講。我們現在政府要不去處罰，好像不太可能。因為你們知道，今年 9 月 28 號馬總統到哪裡去？他到孔廟去，所以我們馬總統就是要建立一個儒教的國家，政教合一，這個教不是宗教，是儒教。這樣的情況下，未來要把這東西不處罰且除罪化的話，是不是透過國會會比較快。你要去找內政部，找行政院長，可能性不是很高。（性交易要不要處罰公民會議，綜合討論一會議逐字稿）

C 公民談到自己立場從主張性交易要處罰，轉變到不處罰，也提出不處罰的條件是「要有好的管理制度」，但沒有提出為什麼主張不處罰的理由。D 公民對於要不要處罰，沒有表達立場。他的發言，已經離題，談到要從行政部門推動性交易除罰化比較困難，但沒有提出支持或反對性交易除罰化的理由。這兩位公民這部分的發言，都不構成「說理」。

(4)成爲結論：公民的論點只要和結論報告裡的内容相符，即記入「成爲結論」。因爲結論報告，不僅提出主張，也說明理由，因此，公民論點中的理由，例如，前述「性交易不合法會導致地下化、造成剝削」，「性工作自主權」，是否被大家接受爲共同理由而納入結論報告，也包括在「成爲結論」的計算。針對每位參與公民，計算提出論點的次數，以及每個論點是否成爲結論的次數，可以統計公民的論點成爲結論的比例而作爲測量值。

(5)開啓新議題：只要發言者所提出的論點既不包含在原有的會議討論大綱，且先前的發言者尚未講過；又或者在原有的大綱與先前的發言者的討論脈絡下，提出了一個新的細節與論點，都是開啓新議題。

例如，在「性交易是否要處罰」公民會議中，討論到對於性交易「政府是否應該介入管理？」，E 公民主張政府要介入管理，但提出「社會協商」的模式：

可能政府要介入管理，那是不是請從業者與經營者組成工（公）會，然後政府去召集這兩個工（公）會來討論配套措施。我覺得是要有兩個力量，都是屬於民間的，由從業者與經營者自己去組成團體與政府直接對話，因為這個行業存在已久，從業者和經營者最知道問題所在，他們可以自己訂出規則，也就是說，職業規範的細則應該由工會訂定出來，然後讓主管機關去同意行不行。（性交易要不要處罰公民會議，綜合討論二會議逐字稿）

E 公民開啓了一個由民間團體和政府透過協商來進行管理的後續討論。F 公民在「社會協商」討論脈絡中，進而主張性工作者的工會應該扮演自律、自我管理角色，例如「個體戶」應該加入工會、納入管理，工會可以辦理保險、健康檢查，這些新的論點，開啓了性工作會工的自律角色的討論。E 和 F 公民的發言都是開啓新議題。²

(6)對話能力：由澄清事實、反對成員、詢問專家、反對專家和反駁專家五個指標構成。在測量上，我把五個指標的次數加總作為對話能力的綜合指標。

「澄清事實」指的是，公民針對議題或者相關內容的實際狀況和運作情形，對上一位相關發言的公民的主張進行修正與澄清。例如，在全民健保公民會議中，李姓公民認為中醫「按摩」沒有療效，健保不應給付；黃姓公民說明，「那是復健，不是按摩」。³

「反對成員」則是公民 B 針對公民 A 的論點提出批評。公民 B 反對該論點的情形可能發生在同一場次，或在不同場次。例如，在全民健保公民會議中，邱姓公民主張要提高部分負擔，「杜絕不必要的就醫，就是要提高自付額，這個就像治亂世用重典，你如果叫他要多拿一點錢去看，他就比較不會去看……」。何姓公民則提出反駁：「我覺得提高部分負擔基本上在懲罰病人，因為他基於一個假設，就是說很多人喜歡亂看病，就說大家會逛醫院嘛，可是我覺得這個假設基本上是有問題的」。⁴

「詢問專家」指的是，在專家對談場次裡，公民向專家提出該議題在政策制定、政策實行、社會群體的處境等特定事實的相關疑問，或是詢問專家的看法。「反對專家」和「反駁專家」指的都是公民批評專家所提出的主張或論點，差別在於反對專家是發生在專家在場的場次（專家對談），反駁專家則是專家不在場時的發言。反駁專家的例子如：

2 性交易要不要處罰公民會議，綜合討論一會議逐字稿。

3 全民健保公民會議，綜合討論二會議逐字稿。

4 全民健保公民會議，綜合討論二會議逐字稿。

今天楊教授在講到限制給付的條件這個部分，他說可以考慮洗腎超過多少年齡就不給付，我覺得這樣的限制不是很公平，因為有些人他可能從來都沒有來申請過這個給付，可是他到了八十歲他開始有這個需要的時候，才說已經超過年齡限制不能給付，這樣我是覺得不太合理。（全民健保公民會議，綜合討論一會議逐字稿）

最後要提的變項是社會經濟位置。本文的要務在分析審議不平等是否存在於不同的社會經濟位置，因此，以性別、教育程度和所得來測量社會經濟位置。在教育程度方面，分為大專教育程度（含）以上，和高中職教育程度（含）以下。在所得方面，則依據次數分配狀況，以家庭每月所得六萬元為切點，⁵ 分為次數約略相等的較高所得和較低所得兩組。表一顯示各場次參與公民在性別、教育程度和所得的次數分配。

3. 統計方法

每場公民會議的參與者為 18 到 20 人。因為人數過少，個別場次的分析無法控制其他社經變項來估計性別、教育程度和所得對審議不平等的影響。為了克服這種分析的困難，我將六場公民會議所有參與公民一起納入迴歸分析。⁶ 我以公民的發言紀錄在發言頻率、發言時間、對話能力、開啓新議題、說理和成為結論等面向的測量值作為依變項，以性別、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作為自變項，進行迴歸分析，檢視社會經濟位置的差異是否影響審議的不平等。前面說過，這六場公民會議都是由同一學術機構主辦，由同一位學者擔任計畫主持人。本文作為分析資料的正式會議過程，六場會議都使用相同的程序結構，

5 問卷調查中，所得為封閉性的選項，分為數個級距；全民健保的級距與其他場次不同，以五萬元為切點。

6 六場公民會議的參與者之中，有四位重複參與（各參加兩場），其中有兩位所得是缺失值，沒有納入分析，另兩位重複參與的個案，並沒有排除，本文雖然將六場公民會議的參與者合併在一起分析，但所有觀察個案的發言情形，是個別場次的統計量，所以重複參與者在不同場次應該視為獨立的個案而納入分析。

時段的劃分方式和會議時間的總長度一樣，參與人數也都為 18 或 20 人。由於程序因素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將六場會議合併分析。由於既有研究已指出，議題屬性可能會影響參與者的發言情形（陳東升 2006；Lin 2005），特定場次可能團體動力(group dynamics)的因素影響言說互動；因此，我將不同的公民會議場次納為控制變項，可以協助我們在排除議題屬性和團體動力對言說互動影響的情況下，分析社會經濟位置對審議不平等的效果。

除了一般模型的迴歸分析之外，我選擇以全民健保、水資源、基因改造食品和性交易四場在「與民衆生活關聯程度」和「技術複雜程度」兩個議題面向上有所不同的場次，進行個別場次的分析。在每個公民會議場次，我統計不同性別、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組別，在發言時間、發言次數、說理、成為結論、對話能力和開啓新議題六個變項上的平均數，而以 Wilcoxon Two-Sample Test 來做檢定不同組別是否有顯著差異。有關這種統計方法的說明請見附錄。由於個別場次的樣本數很少，我只能使用這種適用於小樣本的統計檢定方法，來判斷不同的性別、教育程度和所得組別，在不同言說面向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但無法控制其他變項的干擾，這是本文的研究限制。

（二）質化方法

我使用量化分析來確立社會屬性與審議不平等各個言說面向之間的關聯，而以質化分析來探討我的理論解釋觀點所涵攝的因果機制如何運作，而造成或降低審議的不平等。質化方法的資料有二。一是每場公民會議之後對所有參與者進行深度訪談的逐字稿。深度訪談詢問參與者在審議過程中的參與情形，這是本文建構理論、形成假設重要的資料來源。其次，當我進行統計分析，有了初步的研究發現之後，我從六場公民會議的參與者，抽選 24 人，在 2011 年 10 月和 12 月舉行兩場焦點座談。在焦點座談中，我就本文的研究關切、初步發現與理論觀點，詢問參與者，請他們就本身的參與經驗，討論諸如此類的問題：公民會議的發言是否會有不平等的情形？為什麼？如何改善？

在公民審議的過程中，是不是大家都能講理？形成共識時，是不是盡量尊重大家的意見？為什麼可以，或無法，讓大家討論時能講道理，作結論時能包容各種意見？在焦點座談的過程中，公民自身的經驗，與其他公民交互參照，有著相互詰問或彼此呼應的對話；我也以研究者的理論觀點探問公民，和參與者的自身詮釋作對話，以他們的觀點來驗證、修正我的理論解釋。如此使得研究者的解釋，較能貼近研究對象自身對經驗世界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使研究對象主觀的詮釋，能超越自身經驗的侷限，在與其他參與者和理論觀點的對話過程中，朝向更趨近真實的理解。本文對分析結果的討論，所引用的資料，主要來自這兩場焦點座談。

四、結果

（一）整體結果

表三顯示一般模型的迴歸分析結果。從表三可以看出，在控制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參加場次之後，性別在發言時間、發言頻率、對話能力和論點是否成為結論方面，具有顯著差異。如原先的文獻所預期的，女性發言次數較少、發言時間較短，也比較少在對話過程中質疑、批評他人。女性說理的比例和開啓新議題的次數，雖然低於男性，但差異並不顯著。與文獻預期相反的是，女性的論點成為結論的比例高於男性，且達顯著水準。

再看教育程度的影響。在控制性別、家庭收入和參加場次之後，教育程度在發言時間、對話能力和開啓新議題方面，具有顯著差異。低教育程度的參與者，發言時間較短，也比較少在對話過程中引導討論的方向，或質疑、批評他人。這些結果與理論預期相符。不過，不同教育程度者，在發言次數、說理和論點成為結論方面，並沒有顯著差異。

至於家庭收入，在所有變項上都不顯著。從結果來看，收入並非

表三 整體迴歸分析結果

變項	(1) 成為結論	(2) 說理	(3) 開啓新議題	(4) 對話能力	(5) 發言頻率	(6) 發言時間
性別(女=0)	-0.051* (0.030)	0.045 (0.037)	1.107 (0.706)	1.664* (0.961)	3.649** (1.673)	27.032* (13.678)
教育程度	0.004 (0.032)	0.009 (0.040)	1.575** (0.768)	2.049* (1.044)	1.829 (1.819)	36.376** (14.872)
家庭收入	-0.018 (0.032)	0.015 (0.039)	1.067 (0.749)	0.586 (1.019)	0.941 (1.774)	15.168 (14.506)
代理孕母組	-0.006 (0.053)	-0.067 (0.065)	4.260*** (1.244)	-2.327 (1.693)	3.067 (2.948)	13.353 (24.101)
全民健保組	0.320*** (0.053)	0.106 (0.065)	1.554 (1.245)	-0.192 (1.693)	0.799 (2.949)	55.982** (24.112)
水資源組	0.110** (0.051)	-0.148** (0.063)	2.562** (1.203)	-2.209 (1.636)	0.712 (2.850)	26.812 (23.299)
基因改造組	0.241*** (0.051)	-0.033 (0.063)	3.428*** (1.195)	-3.710** (1.626)	-2.113 (2.832)	13.040 (23.157)
性交易組	-0.047 (0.054)	-0.164** (0.067)	-0.611 (1.266)	0.119 (1.722)	12.798 (2.999)	40.039 (24.522)
常數	0.370*** (0.046)	0.390*** (0.057)	1.101 (1.085)	3.819** (1.476)	8.749** (2.570)	33.420 (21.011)
樣本數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R^2	0.469	0.228	0.273	0.171	0.286	0.196

* $p < .1$, ** $p < .05$, *** $p < .01$

預測審議不平等的良好指標。⁷ 性別和教育程度對審議不平等各個面向的影響，整體來說較為顯著。從教育程度和性別的影響，我們也可以從統計結果中看出重要的趨勢，這趨勢與本文的假設一大致吻合。本文假設認為「社會群體之間的審議不平等，存在於發言頻率、發言時間、開啓新議題、對話能力四個面向，在說理和成為結論這兩個面向則無顯著差異」。從教育程度和性別的整體影響來看，在本文假設存在差異的四個面向上，性別在發言時間、發言頻率和對話能力三個

7 在本文的統計分析中，所得的效果之所以不顯著，有可能是因為公民會議的參與者，家庭所得偏高；為了顧及次數分配的均衡，本文選擇以六萬元作為所得分組的切點，使得高低所得的差異不明顯。

面向上有顯著差異，教育程度則在發言時間、對話能力和開啓新議題三個面向上有顯著差異。而在本文假設不存在顯著差異的兩個面向上，僅在「成爲結論」這個面向，性別有顯著差異，但與既有文獻觀點不同的是，本文發現女性的論點成爲結論的比例反而高於男性。

（二）議題性質與審議能力

接著讓我們從四場公民會議的個別分析來看表現在發言時間、發言次數、說理、成爲結論、對話能力和開啓新議題等面向的審議不平等，是否會因爲不同性質的議題而有所不同。表四顯示統計結果。與一般迴歸分析的結果近似，在個別場次的分析方面，所得並非預測審議不平等的良好指標。無論任何議題，所得對審議不平等的影響，在各個言說面向上，大都不顯著，也較難觀察出一般化的模式。爲了節省篇幅，我在表四中省去了所得的部分，只呈現不同性別和教育程度的統計檢定結果。以下對統計分析結果的說明，也只限定在性別和教育程度的影響。讓我依言說互動的不同面向做說明。

1. 發言次數與發言時間

從統計結果可以發現，女性在全民健保的發言次數較少；在基因改造食品場次，不但發言次數較少，發言時間也較短；其他場次，性別則無顯著差異。教育程度較低者，在全民健保的發言時間較短，在基因改造食品場次，發言次數較少，發言時間也較短；其他場次，教育程度則無顯著差異。低所得群體在水資源的發言次數較多，在性交易場次的發言次數較少。各場次的發言時間，所得的影響均不顯著。

性別與教育程度呈現在發言次數與時間這兩個審議不平等面向上的差異，可以觀察到一般的概況。在技術複雜程度較低的議題，如性交易和水資源，不同性別與教育程度的差異並不顯著。在技術複雜程度較高的議題，如基因改造食品和全民健保，性別和教育程度在發言次數或發言時間方面，則有顯著影響，尤其是在技術程度較高，且與一般民衆生活的關聯相對較少的議題，如基因改造食品，性別與教育程度的影響更是顯著。女性和低教育程度者，在基因改造議題不但發

表四 四場公民會議的審議不平等

公民會議場次	變項	發言行數	發言次數	開啓新議題	對話能力	說理／論點	結論／論點
全民健保	性別						
	男	100.50	13.13*	4.62	3.75	0.49	0.63
	(n=8)	(54.08)	(5.64)	(2.20)	(2.92)	(0.14)	(0.15)
	女	106.30	9.70	5.00	4.70	0.53	0.65
	(n=10)	(74.60)	(6.82)	(2.54)	(6.95)	(0.24)	(0.15)
	教育程度						
	低	84.22*	11.44	4.44	3.11	0.52	0.64
	(n=9)	(56.32)	(6.46)	(2.07)	(2.37)	(0.21)	(0.17)
水資源	高	123.22	11.00	5.22	5.44	0.61	0.65
	(n=9)	(69.36)	(6.69)	(2.64)	(7.32)	(0.13)	(0.11)
	性別						
	男	91.10	13.40	6.00	4.40	0.26	0.43
	(n=10)	(28.88)	(7.90)	(3.50)	(4.33)	(0.13)	(0.15)
	女	104.40	11.60	5.30	3.20	0.29	0.48
	(n=10)	(52.97)	(6.62)	(4.62)	(1.81)	(0.15)	(0.16)
	教育程度						
基因改造	低	95.11	14.33	5.33	4.56	0.23	0.43
	(n=9)	(36.19)	(8.23)	(5.74)	(4.50)	(0.13)	(0.15)
	高	99.91	11.00	5.91	3.18	0.31	0.48
	(n=11)	(48.01)	(6.13)	(1.97)	(1.83)	(0.13)	(0.16)
	性別						
	男	130.00***	13.10**	8.60***	4.10**	0.46	0.52
	(n=10)	(64.73)	(6.61)	(2.72)	(5.00)	(0.19)	(0.22)
	女	61.20	7.60	5.10	1.50	0.33	0.63
性交易除罰化	(n=10)	(24.31)	(3.13)	(2.38)	(1.43)	(0.15)	(0.13)
	教育程度						
	低	52.80**	6.20**	4.20**	0.80**	0.32	0.62
	(n=5)	(12.32)	(1.92)	(2.39)	(0.84)	(0.09)	(0.12)
	高	109.87	11.73	7.73	3.47	0.42	0.56
	(n=15)	(62.03)	(5.99)	(2.79)	(4.21)	(0.20)	(0.20)
	性別						
	男	136.00	25.00	3.00	6.00	0.22	0.25
性交易除罰化	(n=8)	(60.48)	(15.66)	(1.93)	(4.47)	(0.13)	(0.12)
	女	94.70	22.90	2.70	5.70	0.26	0.35
	(n=10)	(62.88)	(9.45)	(2.50)	(4.24)	(0.08)	(0.14)
	教育程度						
	低	92.17	21.00	1.50*	4.00	0.30	0.29
	(n=6)	(36.04)	(9.08)	(1.38)	(3.03)	(0.06)	(0.10)
	高	123.50	25.25	3.50	6.75	0.21	0.31
	(n=12)	(72.84)	(13.67)	(2.28)	(4.54)	(0.11)	(0.15)

註 1：括弧內為標準差。

註 2：統計方法為無母數統計 Kruskal-Wallis Test。

* $p < .1$, ** $p < .05$, *** $p < .01$

言次數較少，發言時間也較短。

2. 對話能力與開啓新議題

就對話能力和開啓新議題這兩個言說面向來說，性別只有在基因改造食品這場公民會議中有所差異。教育程度的作用大致與性別一樣，在基因改造食品這場公民會議中的對話能力和開啓新議題的影響有顯著程度。從結果我們大概可以得知，在基因改造食品這類具有高度技術複雜性的議題，女性和低教育程度者，比較不會在討論過程質疑、批評他人，也比較難以引導討論的議題。另外，教育程度比較高的，在生活影響範圍比較小的議題領域（基因改造食品和性交易），比較能夠開啓討論的議題。在技術複雜程度低、生活影響範圍大的領域（水資源管理），不同性別與教育程度者，無論是在對話能力或開啓議題的審議能力方面，都無顯著差異。

3. 說理及成爲結論

在四場公民會議中，不同的性別、教育程度的公民，在採取說理的方式來陳述論點，以及其論點成爲結論的比例，都沒有顯著的差異。這部分的研究發現與既有文獻的觀點不同。既有文獻指出，弱勢者如女性和低教育、低所得者較不善說理，因此在崇尚理性言說的審議過程中也比較難影響審議的結果。我們的研究則發現，性別與教育程度的作用並不顯著。我們甚至發現，除了基因改造食品之外，女性在其他場次以說理的方式來陳述論點的比例，高過男性。在所有場次中，女性的論點成爲結論的比例，也高過男性，雖然差異並無統計的顯著性。

五、結論與討論

（一）主要研究發現

政治平等是審議民主的核心理念。但很多批評者都指出，審議民主的實踐並沒有落實平等的原則，社會弱勢群體無法平等、有效地參與審議的過程。審議的不平等是否真的存在？如果真的存在，不平等

的實際樣態是什麼？是種普遍的現象，還是視議題脈絡而定的？是在所有言說互動的面向都存在不平等，還是只在某些面向上特別顯著？既有的文獻，對這些問題的經驗研究，要不就很少，要不就付諸闕如。

本文以六場公民會議的資料，對上述審議民主實踐的重大問題，做了經驗探究。本文的研究發現指出，審議不平等確實存在，但不平等的圖像，比現有文獻所呈現的要更為複雜。本文從所得、性別和教育程度來測量可能影響審議不平等的社會位置。本文發現，所得的影響不甚顯著，也看不出一般化的模式；性別和教育程度確實影響言說互動的不平等。不過，性別與教育程度並非對所有言說互動的面向都有顯著的影響。

過去的文獻，對於審議過程中言說互動的面向不做分析上的區分，因為他們通常假定審議不平等在各個言說互動的面向都是一致的。但本文的研究假設認為，在公民會議這種強調說理和共識的審議模式中，因為程序主義的引導，使得審議不平等，在不同的言說面向上有所差異。既有文獻指出，說理的言說模式偏好特定的講話風格，使得講話支支吾吾、無法清楚提出論點的弱勢群體，不能發聲；即使發聲，也難以和他人對話或引導討論方向；追求共識的目標，則使得弱勢群體所關切的議題，因為「難以達成共識」而被排除，無法進入討論的議程。總之，這些文獻認為，比較不擅長說理的人，比較少發言，無法開啓討論的議題，不會去質疑他人的論點，因而也比較不能影響結論。但本文則認為，審議論壇「說理」的程序規範，以及資訊的提供，對「講道理」的言說模式，有鼓勵作用。參與者或許發言頻率不一，但只要發言，大致都能講理。另外，形成共識的程序要求，也使得發言者的論點有比較平等的機會納入結論。

因此本文的假設認為，審議過程的不平等，主要存在於「發言時間」、「發言頻率」、「開啓新議題」和「對話能力」這幾個面向，但在「說理」和「成為結論」這兩個面向並無差異。經驗資料分析大致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設。本文對六場公民會議進行迴歸分析發現，性

別在發言時間、發言頻率和對話能力存在顯著差異，不同教育程度者則在發言時間、開啓新議題和對話能力這些面向呈現顯著差異。整體來說，男性和教育程度較高的社會優勢者，在審議過程中，比較常講話，講話時間比較久，比較可以提出議題來影響討論的方向，也比較會質疑其他公民和專家的觀點，但是男性和教育程度較高者，並不會比女性和教育程度較低者更會在審議過程中說理，社會強勢者的意見也不能主導審議的結論；事實上，分析顯示，女性的意見成為結論的比例甚至高於男性。

以上的結論，是針對六場公民會議，控制參加場次以及社會經濟背景所得到的結果。在一般模式分析之外，我選擇四場在「技術複雜度」和「生活影響範圍」有所差異的四場公民會議，分析性別和教育程度對審議不平等在上述言說互動面向的影響，是否因議題而有所不同。

以前討論審議不平等的文獻，忽略議題性質對審議過程中言說互動的影響。本文認為，表現在發言時間、發言頻率、開啓新議題和對話能力等面向的審議能力，是受到「情境知識」所影響。行動者的社會位置，塑造他們的生活經驗，使他們對特定的議題，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和感受。因此，公民們的情境知識，會因議題性質而不同；他們的審議能力，也就會因為議題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對某些影響範圍比較廣的議題來說，社會弱勢者因為在生活世界中能夠接觸這類議題，可以形成切身感受的經驗知識，因此比較可能在審議過程中發言。例如，水資源的使用，是廣泛影響民衆生活的議題，社會弱勢者對於水價調整，以及各種「開源節流」措施，有來自生活經驗的知識可以表達觀點。至於議題的技術複雜程度比較低的議題，一般公民比較容易了解，因此，即使不具有這類議題的具體經驗，弱勢群體也比較能夠跨過知識的門檻，提出看法。例如女性公民，雖然對於性交易的接觸經驗少於男性，但是，對於成人之間志願的性交易是否要處罰，以及性交易如果要合法化，該有什麼管理措施（如性工作者的從業資格、要不要設專區）等這類技術性知識較不複雜的議題，也能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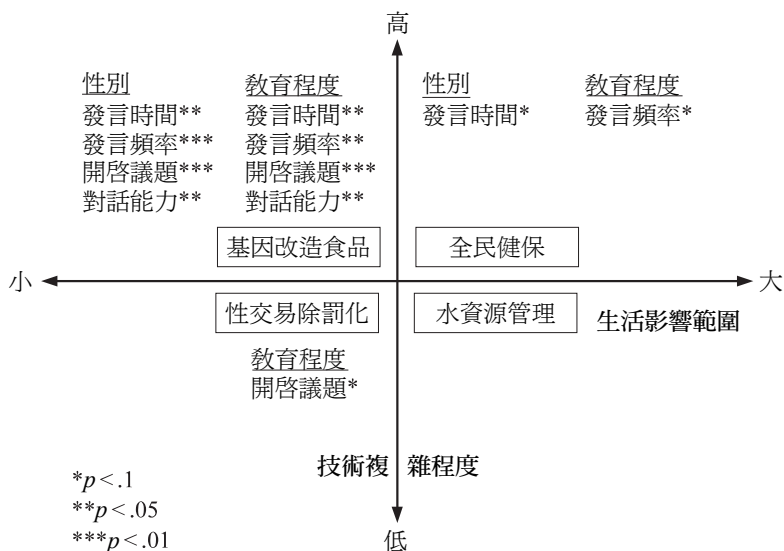
侃侃而談。對於影響範圍比較小、技術知識比較複雜的議題，社會弱勢群體除非其社會位置正好嵌入這類議題，否則比較缺乏審議能力可以介入討論。基因改造食品正是這類的議題。基因改造食品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日益普遍，例如，台灣進口黃豆和玉米大都是來自美國的基因改造食品，可是一般公民並不知道基因改造食品影響的廣泛性；⁸ 基因改造食品的安全性和環境風險評估，也有高度的技術複雜性，社會弱勢者對這類的議題，比較難以發言。

我針對四場議題性質不同的公民會議所進行的案例分析，大致支持研究假設。與一般模式的分析類似，所得的影響較不顯著，而且很難觀察出議題差異。但就性別和教育程度對審議不平等的影響，則有明顯的議題差異。

圖一整理了性別和教育程度在四個議題中具有顯著差異的審議面向。從圖一中可以清楚看出，技術複雜度低、影響範圍大的議題，像水資源，性別和教育程度對於各個審議面向均無顯著的影響。技術複雜度低、影響範圍小的議題，如性交易，性別對各個審議面向並無顯著效果，教育的作用也極有限，只影響開啓討論議題的能力。我們發現，在技術複雜度低的議題，無論生活影響範圍的大小，社會弱勢者（女性和低教育程度者）的發言次數和頻率，並不亞於優勢者。至於像全民健保這種對人民生活影響廣泛的議題，弱勢者的發言機會，會因為技術複雜程度高，而稍微受到限制。我們可以看到，在全民健保公民會議中，女性的發言次數，少於男性；低教育程度者的發言時間，低於高教育程度者。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類的議題，除了發言時間和發言次數之外，性別和教育程度對其他審議面向的影響並不顯著。社會弱勢者可能因為議題性質過於複雜而較少發言，可是來自於生活經驗的情境知識，使他們能夠提出日常生活的關切，來開啓討論的議題，質疑他人的論點。

從水資源、性交易和全民健保的比較可以看出，技術複雜程度阻

8 例如，根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0)的調查，超過三成的民眾沒聽過基因改造食品，也不知道市面上有哪些產品可能是基因改造食品。



圖一 議題性質與審議不平等：性別及教育程度的效果

礙弱勢者的發言機會。如果技術複雜度高的議題，對生活的影響範圍又相對較小，那麼社會弱勢者的審議能力就進一步受到限制了。從基因改造食品公民會議，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性別和教育程度，在發言時間、發言次數、對話能力和開啓新議題這些審議能力的面向，都有顯著的影響。女性和教育程度低的參與者，在基因改造食品公民會議中，比較少發言，發言比較短，比較不會質疑他人，也較難引導討論的議題。

但是，無論議題性質如何，女性和低教育程度等弱勢者，在審議過程中，說理以及影響結論的能力，並不下於男性和高教育程度者。這與一般模式的分析接近。強調說理與共識取向的公民會議，透過程序原則，創造比較符合理性的言說情境，使得弱勢者具有說理的審議能力，也使得他們的關切能夠成為結論。本文的發現因此驗證了既有文獻的部分說法，但也反駁、精鍊一些論點。審議不平等確實存在，但在言說的不同面向存有差異，且視議題而定。

圖一顯示的研究發現，與本文的假設和理論解釋大致吻合。我認為，程序主義的作用，鼓勵說理的討論和共識的凝聚，使得社會群體在「說理」和「影響結論」這兩個審議不平等的面向，無論議題性質如何，都沒有顯著的差異。另外，程序主義也降低公共討論的知識門檻，使弱勢者在技術複雜度低的議題領域，能夠比較平等地參與討論；而情境知識，使參與者對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議題，也能基於自身經驗提出觀點。因此，在技術程度低、生活影響範圍大的議題領域，審議不平等的現象較不顯著。由於程序主義和情境知識的作用，表現在「發言時間」、「發言頻率」、「開啓新議題」和「對話能力」四個面向的審議不平等，在同時具有「技術複雜度高」和「生活影響範圍小」的議題領域，現象最為顯著。以下，讓我針對程序因素和情境知識的作用，引用參與者自身的詮釋觀點，做個說明。

（二）程序因素

本文的研究結果指出，審議不平等，主要顯現在發言時間、發言頻率、開啓新議題，對話能力這四個言說面向，而且，唯有同時具有高度技術複雜性和影響範圍較小的議題，這四個言說面向的審議不平等才具有顯著性。這樣的研究發現似乎告訴我們：審議不平等不如文獻中所認為的那麼嚴重。如果審議不平等，如 Cohen (2009)所言，在既有文獻中有被「誇大」的情況，原因可能也如 Cohen 所說，是因為既有文獻忽略了程序原則可以降低審議的不平等。我們所觀察到的審議不平等，是程序修正後的效果。前面的討論已經提過，程序操作，使得參與者可以講理，也使得他們的意見能夠納入結論。程序原則也創造比較公平的發言機會，尤其是在技術程度較不複雜，以及影響範圍較為廣泛的議題，公民會議的操作程序提升了參與者的知能，使他們在這類的議題更有能力參與審議。

本文的研究資料顯示，根據參與者的認知，公民會議的操作程序，是有助於促成發言的平等的。根據 24 位公民在兩次焦點團體座談所表達的意見，公民會議的審議過程有很多程序因素可以促進平等

發言，其中兩項最重要的因素，一是主持人的作用，二是會議過程提供的閱讀資料、專家對談等資訊，增進公民對議題的了解。⁹

不少公民在參與公民會議之前，少有公開發言的機會，但參加會議之後，變得「比較敢講話」。陳麗惠（假名，下同）雖然參加很多社團，但是，「我比較喜歡默默做事情，不愛講話」，「我以前拿麥克風，話都不敢講」；參加公民會議之後，「連我先生都對我說，『哇，你（講話）進步好多喔！』」¹⁰ 另一位公民劉其相說：「我以前很閉俗，就是不太講話，一直都聽人家講這樣，參加公民會議之後呢，拿了麥克風，就覺得講話是件很痛快的事情……」（2011/10/29）。為什麼這些公民，以前「當眾講話就快暈倒」，參加公民會議之後卻有了轉變？

公民們認為，會議過程中許多程序性的因素，對他們發言形成鼓勵作用。例如，輪流發言的規則，「每人三分鐘，大家有講話的機會」；又如，預備會議階段有三、四個人做小組討論的暖身活動，幫助也很大，「讓大家先在小團體裡面敢發言，然後接著在公民會議的討論裡面，就更願意去表達他的意見。」但最多人談到的，是主持人協助促成平等發言的機會。鄭棟樑談到：

主持人很重要。有人就是很愛講話，講一堆有的沒的，天馬行空，二十個裡面有五、六個這樣一直講，就沒辦法控制，所以當有人搶著要講話的時候，主持人應該用適當的方法來

9 這裡強調的是參與者所指出的促進審議平等最重要的程序因素。一位審查人指出，公民會議在預備會議的「角色扮演」這個程序——請參與者扮演公共政策爭議中不同的行動者，設身處地從他們的角度發言，有助於形成同理心，促成互相說理的溝通情境。黃東益、李翰林、施佳良(2007)的研究指出，七成以上的參與者認為「角色扮演」對瞭解議題有幫助，而越是認為角色扮演有助於瞭解議題的，越可能轉變態度。由於態度轉變是共識形成的基礎之一，可以推論角色扮演這個程序因素有助於將更多成員的意見納入結論。感謝審查人指出這個程序因素。

10 引自2011/10/29公民焦點團體座談會議逐字稿。本節引用參與公民的觀點，皆來自2011/10/29及2011/12/18舉行的「公民審議與社會參與」焦點團體座談。兩次座談各有12位參加過六次公民會議的公民參與討論，反省審議過程。以下標註引文出處時，以2011/10/29表示資料來自當天舉行的焦點座談的會議紀錄逐字稿，2011/12/18表示來自另一場焦點團體討論的逐字稿。

制止，主持人要控制場面，像我參加那場公民會議，主持人好得沒話講啦……。 (2011/10/29)

主持人不但要控制場面，避免讓少數幾個人壟斷發言，而且也要鼓勵比較少講話的發言。黃冬馨、張森海等公民都提到，「如果有人比較少發言，主持人就會說，某某某你要不要講一點什麼？」「有些人不太敢發言，主持人就點他發言」，謝立誠提到：

有些人可能他認知能力有限，或是表達意見能力比較有限，那應該多鼓勵他。像我們那一次，有一位好像認為自己比較不會表達，但是主持人鼓勵他，我們在旁邊的人一起鼓勵他，他最後也願意把他的看法表達出來。 (2011/10/29)

程序規則和主持人的協助，也會在審議過程中創造出公民們互相鼓勵發言的氛圍，黃茂林回想他參加公民會議的經驗：

坐在我左手邊有一位八十幾歲的阿嬤，她就說我只會說台語，我們就說好啊，講台語嘛也通，她講得很慢，可是我們都很耐心聽她講，有時候意思表達不是很清楚，我們還幫他講：「你是這個意思喔？」就是要讓每個人都有講話的機會，所以大家願意說，阿嬤妳年紀比較大妳先講。 (2011/12/18)

主持人的影響之外，公民們認為資訊的提供是促成平等發言的另一重要因素。公民認為，發言的不平等和資訊的差異有關，公民許立中提到，「資訊的不平等一直都是在社會上存在，我們本身所成長的過程、所接受的教育，還有社會環境的經歷都不一樣，所得到的資訊也不一樣」 (2011/12/18)。公民進入審議之前，因為「經驗累積」的差異，對議題的了解程度不一，但每場公民會議都會提供閱讀資料，之

前欠缺相關資訊的，「讀了之後比較了解，開會的時候其實大家都滿有一定的討論基礎的」，「你看了閱讀資料，你有一個粗淺的認識，然後再加上來參加會議的時候，有專家演講，有正反代表的說明或是辯論，那可能就又更深入的瞭解。我想這整個公民會議的過程，是循序漸進、而且很有步驟的提供資訊」(2011/12/18)，使得公民的資訊差異降低，而促進發言的平等。

以前的研究就指出，資訊的提供，不僅有助於降低發言的不平等，也可以促成說理的討論（林國明、陳東升 2003）。24 位參加焦點座談的公民，也都持這樣的看法。他們大都認為，對議題比較了解，就比較能「就事論事」，「講出支持或反對的理由」，「不會像網路打字那麼輕率，隨便發表一些情緒的東西。」如公民張森海所言：

能夠講道理，第一個原因就是資訊的充分，像是有關代理孕母技術方面或是社會、法律方面的問題，能夠講得比較清楚的話，大家對於這些問題能夠了解，這樣就會講道理。
(2011/12/18)

另外，當他們進入審議的過程，就透過主辦單位的介紹，知道公民會議是個相互講理的場合，「公民會議一開始的時候就帶領大家怎麼樣去進行一個講道理的討論」。會議的程序塑造一個說理的氛圍，「專家他們就跟我們講道理，我們的公民也學會講道理啊，所以我們碰到講道理的人我們就學會講道理」。公民們因而從會議過程中，學到講理的討論形式，「我們不是來了很多天嗎？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都不太會講理，後來大家也學會怎麼講道理啦。」(2011/10/29; 2011/12/18)

互相說理、彼此溝通的程序與氛圍，也使得差異意見能夠整合到共識結論中。公民林純亞提到，「在公民審議的過程當中，會有一個要形成共識的氛圍，那可能大家就是順著這個氛圍去做……」

(2011/12/18)；另外，大多數的參與者，都認為他們在公民會議中的重大收穫是學會聆聽、包容和尊重他人的意見，如陳麗惠所言：「參加公民會議以後，我就比較會異中求同，會以對方立場來著想」(2011/10/29)。程序因素造成追求共識和包容差異的氛圍，使得不同位置的參與者的觀點能夠成為結論而影響結果。

發言規則、小組討論的「暖身」、主持人的協助、資訊的提供、結論的形成方式，這些程序因素創造一些比較理想的言說情境，提高參與者的審議能力，促進較為平等的發言機會。程序因素也創造鼓勵發言、相互講理和包容差異的互動氛圍，降低了審議的不平等。

（三）情境知識、教育與性別

前面從行動者的觀點，來說明程序因素如何降低發言的不平等，以及促成說理、包容的溝通。即使程序操作會對審議不平等產生修正作用，但我們的研究發現，在具有技術複雜性、影響範圍較不廣泛的議題，參與者在發言頻率、發言時間、開啓新議題和對話能力方面，還是存在著性別與教育程度的差異。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

參與公民認為，「如果議題和我們有切身關係，就會發言」，「我們認為是嚴重的，講話就會大聲一點；如果對我們影響狀況不大，我們就會覺得沒什麼差，正反意見也不好判斷，這是我們會不會發言的主因啦」(2011/10/29)。如果是與自己生活經驗無關，「平常又沒有蒐集這方面資料的習慣」，對議題就比較不了解。依據參與者的說法，公民會議「提供很多資訊，讓我們對這些議題更了解」，「有懂一點的話就比較敢講話」。不過，公民徐忠勵也指出，對於會議提供的資訊，「大家思考的背景和理解的基礎很不一樣」，「比較淺顯的部分，大家都容易了解，有些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它會比較深一點，不是每個人都懂」(2011/12/18)。即使是與自己生活有關的議題，有些討論的主題是超越個人直接的經驗層次，需要比較「深層的思考」，對某些公民來說，還是有理解的困難，也比較不會發言。

公民的詮釋觀點，在此呼應本文的理論主張：情境知識影響審議

的不平等，且與程序因素共同作用。與自己日常生活經驗相關的議題，參與者具有情境知識可以發言；但對於技術複雜程度較高的議題，即使與日常生活關聯，有些公民也會因為討論的知識門檻過高而無法有效參與。公民會議透過一些程序作為提升公民參與討論的能力，使得技術複雜程度較低的議題，無論對生活影響範圍是大是小，公民審議的不平等現象並不顯著。但是對於具有高度技術複雜性的議題，公民之間審議能力的差異就顯現出來了。前面的分析已經指出，教育程度，是造成審議能力差異的因素之一。根據公民自己的說法，教育之所以會造成發言的差異，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高教育程度者，比較有多一點超越個人生活經驗的資訊來源。根據公民張森海的說法，很多人的看法會侷限在和自己生活有關的領域，「平常在做附近工作或種田的，他平常比較少關心這個，你問他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說」，「如果他知識水準比較高，就算他本身不是做這個事情的，他的資訊來源會比較多一點，接觸比較廣，看法就比較多。就算不是他很熟的東西，他也會有比較多的觀點」(2011/12/18)。教育程度比較高的公民，可能在進入公民會議之前，就已經累積比較多的知識；進入公民會議的審議場域之後，對於閱讀資料和專家對話所提供的資訊，尤其是相對困難的議題，「吸收能力比較好」、「知道比較多」，因此能夠踴躍發言。

這些解釋，大體是認為審議能力與知識有關，教育程度比較高的公民，比較能夠取得相關的議題知識，尤其是相對複雜的，超越個人生活經驗的議題。但是，也有公民提到，發言程度與個性有關，其中一個重要的特質是「自信」。「像有些知識水準比較高的，他們就比較自信，比較敢講」(2011/10/29)。根據這些公民的解釋，教育程度高的人，之所以「比較敢講」，並不是因為他們對議題真的比較懂，而是因為他們比較有自信，勇於對自己可能並不熟悉的議題發言，這是一種從教養與社會交往過程學得的習性，轉化為審議的能力。

本文的研究發現，除了教育之外，性別在具有高度技術複雜性的議題，也造成審議的不平等。根據公民的解釋，性別的發言差異，並

非反映知識能力的差異，而是社會化、教養，以及性別化的社會言說文化所造成。前面提過，許多討論性別言說風格差異的文獻都指出，男性比較會採取衝突性的、有主見的，直白的講話方式，女性講話則比較顧及和諧、顯得猶豫和委婉，也比較在意表達的清晰和準確。公民們在反省審議過程中發言的性別差異時，提到的看法和文獻相近。有公民提到，「在成長過程中，女孩子就被塑造成要順從，不要有強烈意見」(2011/12/18)。公民會議所討論的議題，是有衝突性的，呈現對立的觀點。女性對於不熟悉又有對立觀點的議題，例如基因改造食品的健康和環境風險爭議以及管制手段，就比較少講話。「男性就不太一樣。男性會偏執，愛講話的比率比較高一點了，就是意見比較強烈，不管他對議題了解多少，他就是要一直講，社會也允許」(2011/10/29)。根據公民的意見，女性對不熟悉的議題，比較不常表達意見，除了避免介入對立性的言說之外，同時也是因為言說的風格和男性有差異的緣故，公民林淑惠認為，「男性講話比較直接，自己想的就直接表達出來。女性的語言比較精緻，講的內容要先思考過，要講得比較準確，所以要想得比較久」(2011/12/18)。因此對於比較複雜的議題，因為需要「比較久的思考」，或找不到適當的語言來精確表達她的看法，也就比較少發言，也比較不可能去質疑他人的論點，或引導討論的方向。根據公民們的看法，對於技術複雜的議題，男性較常發言且較具主導性，不是因為他們「比較懂」，而是這類「大家都不熟」的議題，性別言說風格的差異，導致了審議的不平等。

雖然女性在技術複雜度較高的議題，比較少發言，但是她們影響結論的能力，並不亞於男性。這一方面是因為前面提到的程序因素的作用，使得共識取向的討論，在結論形成過程盡量包容各種意見，另一方面，則是社會文化因素所型塑的性別言說風格，與本文的解釋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前面提過，女性發言比較缺乏自信，顧及和諧而迴避衝突，她們比較不會堅持己見，或是發表與多數意見相衝突的論點，這可能使得女性發言的論點，被納入結論的比例高於男性。

（四）貢獻、限制與展望

過去有限的經驗研究文獻，或者僅以發言時間和頻率來測量審議不平等，或假定所有言說面向都存在不平等（陳東升 2006；Karpowitz, Raphael, and Hammond 2009; Karpowitz, Mendelberg and Shaker 2012; Lin 2005）。本文認為，光以發言時間和頻率來測量不平等，將造成「審議」概念的稀薄化。我用「發言時間」、「發言頻率」、「開啓新議題」、「對話能力」、「說理」和「成為結論」六大面向來測量審議的不平等，並且指出，由於程序主義的作用，不同背景的公民，進入公民會議這種審議情境，大抵都能說理和影響結論。也就是說，審議不平等只存在於「發言時間」、「發言頻率」、「開啓新議題」、「對話能力」四個面向，這四個面向的不平等，在高度技術複雜性和生活影響範圍小的議題，最為顯著；在低技術複雜程度和生活影響範圍大的議題，則較不顯著。也就是說，如果人們感知到公共議題和自己生活經驗的關聯，並能了解這些議題，將大大降低審議的不平等。本文的經驗分析，支持以上的假設。

在所有言說面向中，「說理」和「影響結論」應該是審議不平等最核心的關切。畢竟，人們之所以關切審議過程中言說互動的不平等，是擔心居於劣勢的參與者意見遭受排除而無法影響結論。而參與者之所以在審議過程中無法發聲，是因為審議程序中崇尚理性的言說風格壓抑了不善說理的弱勢群體的表達方式。但本文的經驗研究指出，無論什麼議題，社會群體在「說理」和「影響結論」這兩個面向並無顯著差異；甚至於，女性的意見比起男性還更可能影響結論。

上述研究發現反駁、修正和補充了既有文獻對審議不平等的見解，是本文重要的貢獻。本文的資料來源，包括多個場次的審議經驗，在測量方面也擴大審議不平等的面向，這在研究方法上有所貢獻，但本文的分析仍有所限制。每一場公民會議的參與人數都在 20 人以內，參與人數過少，使研究者在估計社會群體屬性對審議不平等的影響時，難以控制其他變項。爲了克服操作「控制變項」的困難，我將六場公民會議的參與者合併在一起作迴歸分析。但在個別場次的分

析，只能就「性別」、「教育程度」和「所得」這三個社經變項，與六個審議不平等的面向的關聯，做雙變項的統計檢定，但無法控制其他變項的干擾，這是本文分析的一大限制。另外，我根據參與者對議題性質的評估，選擇水資源、性交易、全民健保和基因改造食品四場公民會議，代表技術複雜度的高低和生活影響範圍影響的大小所交織而成的四個議題類型。本文用特定的單一場次來代表議題類型，可能存在選擇的偏誤。未來，可能需要發展更有效的指標來界定議題性質，在各個議題類型中蒐集更多場次的資料，來檢證本文所宣稱的「審議不平等的顯著程度會因議題性質不同而有所差異」這個命題。

本文的發現指出，弱勢者說理和影響結論的能力，並不亞於優勢群體。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對審議的平等性過度樂觀，而忽略了掩蔽結構不平等的「霸權論述」可能主導審議的結論。Young (2003)曾經提醒我們，即使弱勢者在審議過程中能夠平等地參與發言，也不意味著她們能夠挑戰主流的霸權論述。Young 指出，霸權論述是一套擴散於社會，說明社會如何運作的故事與專家知識體系，它設下了框架，引導問題的討論和解決方案的提出。反映了社會優勢利益的霸權論述，包含偏見、誤解和矛盾，卻未被察覺與批判。囿於劣勢群體特定的言說風格，例如，女性習於採用顧及和諧、避免衝突的言詞，即使主流論述的偏見被弱勢者所察覺，也難被批判與挑戰。弱勢者可能在霸權論述的框架下講道理。即使他們的說理能力和影響結論的機會，與優勢群體沒有顯著差異，但不能忽略霸權論述可能扭曲了溝通的情境。

在這樣的警覺之下，本文的研究發現對如何促進審議的平等，仍有重要的實踐意涵。許多文獻指出，程序引導的審議論壇，強調理性溝通的言說模式，將造成審議的不平等。但本文的研究卻發現，透過人為設計的程序來指引如何進行公共討論的審議模式，如公民會議這種「微型公眾」，卻能藉由操作程序提升了參與者的知能，建立公平發言的機會，創造相互尊重、包容異見的言說規範，而降低了審議的不平等。如何在公共議題的對話中，推廣這類的審議模式，而促進公民審議更為廣泛的平等，是重要的實踐課題。

程序因素之所以能夠促進審議的平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資訊的提供，降低了討論的知識門檻，如 Cohen (2009)和 Fung (2003)所指出的。但本文的研究也發現，這種效果在技術複雜度高、生活影響範圍小的議題領域，比較有限。不過，議題的技術複雜度和影響範圍，並不是議題的固有特質所決定的。公共審議的辦理單位，對討論主題的框架設定，以及資訊提供的內容，可能化複雜為簡單，讓參與者更容易瞭解，也可能將討論主題與公眾日常生活，或公眾關切的重大社會價值，做更緊密的連結。¹¹ 也就是說，如果本文宣稱的「程序因素和情境知識影響審議的不平等」這個理論是正確的，公共審議的實踐者，在規劃審議程序時，應該著力於降低公共審議的知識門檻，並將審議主題的框架連結到公眾日常生活的關切，才能進一步促進審議的平等。

本文也發現，光是程序因素本身，對降低審議的不平等是有所侷限的。對於具有高度技術複雜性，以及生活影響範圍較小的議題，審議不平等的情形顯著存在。雖然程序因素可以產生一些降低不平等的效果，但這些議題領域的不平等，還是受到社會文化結構因素的作用，例如教育程度，以及不同性別言說風格的差異。除了前面提到的程序主義的框架設定和資訊提供之外，透過有效的公共教育與溝通，降低議題的知識門檻，使議題能被廣泛理解，使弱勢位置的群體有能力和信心可以發言，這是降低審議不平等的重要實踐策略。另外，如果公眾能夠感知討論議題和日常生活的關聯，他們也就能夠發展出「情境知識」，而覺得有話要說。議題與日常生活的關聯，不是「客觀」的關係，而是要能被行動者主觀地經驗到、認知到。例如，基因改造食品雖然普遍存在於多數公眾的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卻缺乏這方面的資訊，而沒有認知到它的關聯性。人們忽略很多公共議題，不是因為它們和日常生活沒有直接關聯，而是不知道它們有關聯。情境知識不是客觀的社會位置所形塑的，而是人們能夠藉由認知、詮釋的過程，而從他們的社會位置了解議題與生活經驗的關聯。公共議題如果

11 感謝一位審查人對本文研究發現的實踐意涵，作此建議。

受到更多的討論和關注，產生更多散佈於社會各領域的資訊，越多社會公眾就能具有不同社會位置的情境知識，而平等地參與討論。更多更廣的公共審議，可以創造更平等的公共審議！

誌謝：本文的研究和寫作歷程很長，要感謝的人也很多。我要大力感謝洪晨碩在統計分析方面所做的貢獻，以及其他資料蒐集所提供的協助；謝新誼在統計資料的整理也幫了很大的忙。邱彥瑜、徐靖旻、陳含葦和劉若凡辛苦地過錄會議逐字稿並訪談公民，盧孟宗、林佳瑩協助辦理公民座談焦點座談。我懷念與這些學生、助理共同討論的研究時光，也感謝他們的努力付出。本文的資料來自我擔任計畫主持人的六場公民會議，感謝這六場公民會議的所有參與者，尤其是參與審議的公民們；部分公民後來接受訪談，參加焦點座談。沒有這些公民的參與經驗和想法，就沒有這篇論文。感謝六場公民會議的專任助理葉欣怡、吳璧如、易俊宏和呂家華，以及兼任助理們的協助。本文的研究發現曾在 2013 年台灣社會學年會，以及 East Asian Junior Workshop 報告，感謝與會者的問題與意見；也感謝台大社會系博士班課程「審議民主的理論與實踐專題討論」和大學部課程「審議民主與公民參與」的修課學生，對本文初稿的討論與批評。本文研究成果主要來自科技部（國科會）補助的專題研究計畫「審議民主與平等參與」（計畫編號 NSC99-2410-H-002-176-），特此致謝。最後，謝謝本刊兩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以及謝麗玲在編輯上的專業協助。

附錄：統計方法說明

Wilcoxon Two-Sample Test 是一種無母數統計方法，適用於兩獨立樣本的統計檢定，其資料性質至少要是序列級數(ordinal variables)。相較於一般的 t-test 檢定，Wilcoxon Two-Sample Test 不需要假設母體為常態分配，可用於小樣本的統計分析。此統計方法用在兩獨立樣本時，可進行單尾跟雙尾檢定。當我們採用雙尾檢定時，其虛無假設和對立假設舉例如下：EX: 當我們希望了解不同性別在發言次數的問題上是否有差異時，其虛無假設 H_0 ：男生跟女生在發言次數上一樣多；對立假設為 H_1 ：男生跟女生在發言次數上有顯著差異。採取此統計方法時，其統計顯著性 α 可由研究者自行設定，一般也是用 $\alpha = 0.05$ 。判斷方式為：當 two-sided $p\text{-value} < \alpha = 0.05$ ，我們可以拒絕虛無假設，接受對立假設。本研究使用之統計軟體為 SAS 9.2 統計套裝軟體，程式語法為 the npar1way procedure。在運用 Wilcoxon Two-Sample Test 時，常常會採用 normal approximation 方法。本研究在統計顯著性的判定上，採用 SAS 9.2 統計套裝軟體提供的 normal approximation 統計方法。然而，上述方法需要較大的樣本數（如 n_1 或 n_2 大於 20），但因為本研究之每一分組樣本數通常只有 10 個左右，統計結果也許不準。因此我們另外利用 the npar1way procedure 中的 exact method 來輔助我們的判斷，其方法適用於更小的樣本。Exact test 的判斷方式為：當 Two-Sided $\Pr > = |S - \text{Mean}| < \alpha = 0.05$ ，我們可以拒絕虛無假設，接受對立假設。大部分 Exact test 跟 normal approximation 的統計結果沒有差異。

參考文獻

- 林祐聖(2007)我們沒有台上台下之分：代理孕母公民共識會議中的專家與常民關係。台灣民主季刊 4(3): 1-32。
- (2010)從歧見到共識：公共審議中的網絡平衡。台灣民主季刊 7(2): 177-216。
- 林國明(2009a)公共領域、公民社會與審議民主。思想 11: 181-195。
- (2009b)國家、公民社會與審議民主：公民會議在台灣的發展經。台灣社會學 17:161-217。
- (2013)多元的公民審議如何可能？程序主義與公民社會觀點。台灣民主季刊 10(4):137-83。
- 林國明、陳東升(2003)公民會議與審議民主：全民健保的公民參與經驗。台灣社會學 6: 61-118。
- 范雲(2010)說故事與民主討論：一個公民社會內部族群對話論壇的分析。台灣民主季刊 7(1): 65-105。
- 陳東升(2006)審議民主的限制：台灣公民會議的經驗。台灣民主季刊 3(1): 77-104
- 黃東益、李翰林、施佳良(2007)「搏感情」或「講道理」？：公共審議中參與者自我轉化機制之探討。東吳政治學報 25(1): 39-71。
- 黃東益、施佳良、傅凱若(2007)地方公共審議說理過程初探：2005 年宜蘭社大公民會議個案研究。公共行政學報 24: 71-102。
- 黃競涓(2008)女性主義對審議式民主之支持與批判。台灣民主季刊 5(3): 33-69。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0)民衆對生物技術及基因改造食品的認知及態度調查報告。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 <http://consumer.fd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4&pid=371>。
- Abers, Rebecca Neaera (2000) *Inventing Local Democracy: Grassroots Politics in Brazil*. Boulder, CO: Lynne Reiner Publishers.
- Baiocchi, Gianpaolo(2005) *Militants and Citizens: The Politics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Porto Aleg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hman, James (1996) *Public Deliberation: Pluralism, Complexity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ohman, James, and William Rehg, eds. (1997) Introduction, Pp. ix-xxx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ssays on Reason and Politics*, edited by James Bohman and William Reh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hambers, Simone (2003) Deliberative Democratic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 Science* 6: 307-326.
- Cohen, Joshua (2009) Reflections 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p. 247-263 in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by Thomas Christiano and John Christman. Blackwell Publishing.
- Crawford, M. (1995) *Talking Difference*. London: Sage.
- (2001) Gender and Language. Pp. 228-244 in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Women and Gender*, edited by R. Unger. New York: Wiley.
- DeBardeleben, Joan, and Jon H. Pammett (2009) *Activating the Citizen: Dilemmas of Participation in Europe and Canad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Dryzek, John S. (2000)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 Liberals, Critics, Contes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ster, Jon (1998) Introduction. Pp. 1-18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dited by Jon Elst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aser, Nancy (1994)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Pp. 109-142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ited by C. Calhoun. Cambridge: MIT Press.
- Fung, Archon (2003) Survey Article: Recipes for Public Spheres: Eight Institutional Design Choic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1(3): 338-367.
- Gray, J. (1992)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The Classic Guide to Understanding the Opposite Sex*.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Gutmann, Amy, and Dennis Thompson (1996)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 (2004) *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T. McCarth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1991)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arpowitz, Christopher F., Tali Mendelberg, and Lee Shaker (2012) Gender Inequality in Deliberative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3): 533-547.
- Karpowitz, Christopher F., Chad Raphael, and Allen S. Hammond (2009)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Inequality: Two Cheers for Enclave Deliberation among the Disempowered. *Politics and Society* 37: 576-615.
- Lakoff, Robin Tolmach (1975)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 Text and Commentaries*.

- New York: Harper & Row.
- Lin, Kuoming (2005) Deliberative Inequalities: Experiences from Three Consensus Conference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rganized by Taiwan Thinktank, August 29-30, Taipei.
- Manin, Bernard (1987) On Legitimacy and Political Deliberation. *Political Theory* 15 (3): 338-368.
- Marien, Sofie, Marc Hooghe, and Ellen Quintelier (2010) Inequalities in Non-institutionalised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25 countries. *Political Studies* 58:187-213.
- Parkinson, John (2006) *Deliberating in the Real World: Problems of Legitimacy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pp, Danielle, Roxanne A. Donovan, Mary Crawford, Kerry L. Marsh, and Melanie Peele(2003) Gender, Race, and Speech Style Stereotypes. *Sex Roles* 48(7/8):317-325.
- Sanders, Lynn (1997) Against Deliberation. *Political Theory* 25: 347-376.
- Siegler, D. M., and R. S. Siegler (1976) Stereotypes of Males' and Females' Speech. *Psychological Reports*. 39:167-170.
- Thompson, Dennis (2008) Deliberative Democratic Theory and Empirical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1(1): 497-520.
- Verba, Sidney;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2004) Political Equality: What Do We Know about It. Pp. 635-666 in *Social Inequality*, edited by Kathryn M. Neckerman. New York: Russell Sage.
- Young, Iris Marion (1997) Difference as a Resource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Pp. 383-406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ssays on Reason and Politics*, edited by James Bohman and William Reh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2002) *Inclusion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3) Activist Challenges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p. 102-120 in *Deba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dited by Jame S., Fishkin and Peter Laslett.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